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五期 ——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9c)

【史料辨析】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	高 华
【史海钩沉】毛泽东在“滴水洞”与世隔绝十一天的前前后后	张耀祠
【痛定思痛】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与王光美和刘源商榷	汤 本
【春秋史笔】周恩来与刘少奇之死	樊 功
【研究动态】“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	衣晓龙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料辨析】

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

• 高 华 •

古曰：“诗言志”，作为20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与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刘少奇和其他领导

人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必须承担起指导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很快，谜底终于解开，这是毛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8日然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南巡期间，毛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根据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著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38—40页）

形迹隐秘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以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到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是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仔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毛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按：何种革命家？），毛终身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执着地相信，惟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已退入“二线”，毛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后来几年，毛越来越感到，刘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越来越像博物馆的某种陈列（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32—33页）。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5亿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曹英等着：“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268—270页，改革出版社，1998）毛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和秩序的务实做法，与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矛盾，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此举以后又被毛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根本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惟有毛才是共产党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顿时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之因。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因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是彼欲“取而代之”意图的流露。毛认为，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对于原则问题，他说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经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拍抚”。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线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父亲的拒绝。毛对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1964年末，毛泽东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本事，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现在毛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了让他沉闷的北京（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

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

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了，就是不听我的话”）。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说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那之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策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惟谨，别无其他任何选择（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说，当时在北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高校校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壮怀激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喻大轰皆流于形势，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泽东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作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个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事们很难裁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在“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必恭必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刘少奇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

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等在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时表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了出来），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的情况。

毛泽东在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势和新文化，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构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直接交流。毛将暂时把党的机构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说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找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一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由毛共制造的又一个旷古之灾，终于正式发动起来了……

~~~~~

## 【史海钩沉】

毛泽东在“滴水洞”与世隔绝十一天的前前后后

• 张耀祠 •

1966年6月16日，我们随主席乘专列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当日到南昌住了一晚。

17日，列车直奔湖南长沙，在九所6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这是毛主席继1959年的第二次回故乡。那一次，他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回他又要写下一些什么呢？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主席是有心事的。当然，如果从表面上看，主席是要避一避这闹哄哄的世界。

6月18日，下午3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肖根如陪我们一道直奔滴水洞。

主席坐在一辆吉普车上，我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走在主席的前面，主席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那上面坐的是随行的警卫人员。

到了洞口，8341部队一部份进了3号楼，我和高文礼、钱嗣杰及部份警卫部队住进了2号楼，毛主席住进了1号楼，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毛主席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当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跟我一起住在2号楼，一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同时，也作了明确的分工，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由当地的警卫部队负责，内卫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毛主席看见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冷气’不错嘛。”

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听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是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那封信中。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了，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毛主席还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但那时，毛主席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然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及江青“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了去，做了大量的坏

事，后来毛主席也控制不了他们了。

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离洞口300米远

主席在滴水洞也想到了游泳。1959年他去过韶山水库游泳，这次主席是不是还要去游呢？

这天，主席叫我去看了，他说：“耀祠你去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  
我说：“好吧。”

我没有带任何人就去了青年湖。说是湖，其实是一个大水库，把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这样储了很深的水，黑压压的，水面清澈，难以见底。

我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拿了一把锄头，在水库旁边的地里干活。他见我在观看水库，便叹了一口气，说：“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给淹了，这些土地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回到滴水洞，我对主席说：“青年湖是可以游的，水面很清。”

我说：“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农民。”于是我把这个农民所讲的话学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的”时，主席笑了。

一向有游泳爱好的毛泽东，却没有去游泳。叫我去看了青年湖，我说可以游，但他也没有去。我知道主席的脾气，我要是说不能游，主席很可能非去游不可了。当然，这次来滴水洞也许有着别的思想情绪上的因素，主席也没有去韶山水库游泳。

主席没有离开过滴水洞，要说离开也只不过有300米远。

22日上午，主席看见大门口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

从1号楼出来，我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局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四人陪同，由曲、高二人推着轮椅。毛主席坐在上面，有一种天真的童趣。

马路左侧紧靠大山，上不去。马路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一条小溪流过，水很小。再往右，仍是大山，大雨滂沱时，山洪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

毛主席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我们推着主席从原路回来了，最多不过300米远。

这期间，毛主席同我们照了一张像，这张像，我至今还珍藏着。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毛主席住在滴水洞、湖南省委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较近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主席28号走，便请主席跟他们开会的同志照个像，毛主席欣然同意了。

26日下午，毛主席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同志，并一块合了影。工作人员向我提出“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像。”我对他们讲：“你们等着，我向主席说说。”当我向主席提出大家的愿望时，主席说：“好嘛！”

28日下午，毛主席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像。这时，他对大家讲道：“你们走吧！”

说着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主席又折了回来，便忙给端上茶。主席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

在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他显得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到了武汉。直到7月16日，主席才正式公开露面。他在武汉接见了几批外国客人。

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

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

为什么主席把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

毛主席的信写毕，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备存，原信寄给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她接到毛主席的信后，感觉自己不得了啦，变得猖狂起来了，成了一位“复仇女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毛主席这封信，已不失为一部“预言书”。林彪出逃后，中央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的会议文件下发。于是，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人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看得太透了。

□ 摘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

【痛定思痛】

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与王光美和刘源商榷

• 汤 本 •

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圣诞节之前谈，会使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依稀还有点印象，或者

全然不知但还有兴趣的朋友们，感到沉重，感到复杂，往往一时难以言喻。思考文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之所以不容易，传统的中国人思考问题，寻找现实社会和历史的罪恶根源，常常是外向的，枪杆子永远是向外的，杀别人的；笔杆子永远是批判别人的，而不是面向自己的，而不是挖掘自己的，而不是反省自己的。

还需要强调的，在美国谈论文革、研究文革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美国没有文革研究基金会，那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人不管。但美国各专科学研究，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等等，都有涉及文革的研究资助，笔者没有作类似的项目申请，因此算，本文写作的时间，是笔者的义务工作，这样，先要杜绝今后有可能会出现的“拿了美帝国主义的钱，来咒骂我们中国人”的任何的无妄谴责。但我相信，至少王光美女士和刘源先生不会，以他们接受过1949年前最好的教育（王光美）以及接受过改革后的77级的大学教育（刘源），以他们的良知，以他们的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的反省。

还是回到本题，“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

笔者的观点是：刘少奇的死，是毛泽东之罪，是拥戴毛泽东的人民之罪，也是把毛泽东捧到“最高独裁者”而出了大力的刘少奇自己的罪。

我想，前半句的话，是王光美女士很要听的，而后半句“刘少奇也有罪”的话，是她和刘源绝不愿意听的。

产生“刘少奇的死，是谁之罪？”这个问题，源起美国版的新民晚报2000年12月19日刊登的王光美、刘源等着的一书《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的第一部份。

应该客观地说，在这本书连载的第一部份，是王光美和刘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提出了不少很值得今人思考的问题：

如：“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悲剧却远远没有结束！……刘少奇的大悲剧还没有完结。”

如：“中国人民面临…人人拷问自己，人人否定自己。”

如：“到了真正能够说得清楚…哪些是刘少奇的大错误，哪些不是（刘少奇的）错误，那些干脆就是别人的错误的那一天，这位国家主席的悲剧才算接近了尾声，文革的悲剧才算帷幕即落”。

如：“刘少奇，坐在主席的椅子上，想的是国家的事，办的是百姓的事，…导致他被打倒的‘错误’也大多数是来自他的小民意识。”

但是，一些基本的思考和重大的问题，是王光美和刘源不能回避的，而且也是他们限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体系现状，所不敢思考，所不能表达的：

如：正因为刘少奇没有阻止和谴责毛泽东和康生无耻枪杀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王实味，刘少奇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如：正因为刘少奇第一个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才是使全民陷入一场政治专制、经济崩溃、文化思想专制禁锢的几十年极权社会的开端。

如：正因为刘少奇参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无耻关押、迫害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刘少奇最终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如：正因为刘少奇参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无耻镇压、迫害几十万个右派分子（笔者的大哥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只有18岁），刘少奇最终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如：正因为刘少奇参与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打倒“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说出了“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的话（但愿是不确实的传言），刘少奇最终才将自己置于死地。
等等，等等。

但是，有两方面的思考，可以与该书作者和网友们分享：

一是，文章提到，刘少奇是人民的“前国家主席”，显然，作者们想竭力肯定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的法定性，但是，作者忽略了，如果刘少奇的国家主席的“法定性”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中国共产党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毛泽东的所谓“法定性”（或者说是“党定性”）也不容置疑。这就是专制社会的症结，刘少奇的被任名为“国家主席”本身就是人治中国的一个成果。人治的开端，以人治的悲剧（刘少奇之死）结尾，这之间，有着不可切断的必然性。很难要求当时的中国人民接受一个“人治”产生的国家主席，而不接受一个权威更大的“枪杆子里”产生的毛泽东的军委主席的这样的一种事实。更何况，毛泽东的神魅力量也是经由刘少奇助长起来的。更何况，五十年代上半年代的北京市“确实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李泽厚语，参见《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1997年）

尽管，作者强调的，在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中，当时按刘少奇的路线办，中国大陆会提前很多年走上小康生活。实在肯定这种体制下的一种美好假设，但这一假设正因为毛泽东的存在和产生毛泽东的革命所造就的个人集权的帝王式政治存在，而不是历史事实，只是假设。历史是悲剧，历史是灾难，但是事实。这一灾难，原因很多，历史的，个人的，国际的，百年的中国屈辱史的，还有政党的，也包括刘少奇的责任，刘少奇在造成独裁毛泽东的过程中，不能辞其疚。

二是，对于笔者来说，对于王光美、对于刘源来说，一个很艰深的问题是，批判人民是很容易的。人民是抽象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中国人民犯了人类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拥戴了一个“一党专制”的社会，拥戴了一个一党专制上的“皇帝”毛泽东。而且，当每一个人，也就是每一个的“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在批判人民的“错误”，都是把“我”排斥在外的。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民”中的“我”都作如此的对人民的批判，而不对自己经历过的那个社会和文革有任何反省，这种对人民的批判仍然是极为肤浅的。因为每一个“我”对抽象的“整体的人民”展开深刻的大批判，而对自己作为一分子的“我”，没有任何反省的话，事实上，这“整体人民”就没有完成这个自我批判。

因此，深刻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深刻地批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1949年—1966年的政治中国，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要深刻的反省自我。笔者的这个观点，最初的表达，是在几年前，对张戎《鸿》、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两书的评论时所表达的（参见《社会民主的进程和民族的反省·纵论天下》）。

换言之，王光美、刘源在他们的书中，如果只是热衷于批判他人，批判“整体性的人民”，而不对自己曾在1949—1966年的积极的政治盲从作出深刻的反省，他们的思考仍然是有局限的，仍是缺乏历史所必须的深刻批判精神和建设精神的。

因此，对于经历过文革的绝大多数的人们来说，批判人民，还是批判自我？这是肤浅者、激烈革命家和智者的分野。

无论如何，王光美女士和刘源的著作有他们很重要的正面意义。对于一个中国事务和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笔者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新一波的文革批判，是否意味着江泽民的“体制创新”的舆论准备？

从个人角度来将，刘源先生可以有这样一种思考：当再优秀的“武警政委”，也不如当一个优秀的具有人类性的大反省、大思考的作家。当然，也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个有着深刻人道精神和人性文明的“武警政委”，将比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讲政治”的“武警政委”要理性、人道、文明很多。

圣诞节之前，让我们（笔者和网友们，当然也希望王光美女士、刘源先生能够参与的“我们”）思考“文革”——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也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

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和深刻自我反省之后，自然将会产生精神的大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道路的方向是什么？

建设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的、民族的“中国性格”，这是一个与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深化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伟大事业。

人类真是有幸，有“美国性格”（American Character）在美利坚土地上根深蒂固的成长，这是人类之福。

“美国性格”正在努力抵御美国的左派和极端自由派的对美国基本文化精神的腐蚀和负面作用，正在向全世界显露她的影响力。“美国性格”，这对于“中国性格”的形成，有了一个至为重要的文明、文化、道德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真正深入的学习，将会影响未来的中国与美国。这又是一个重大题目，期望网友们的关注。

圣诞节之前，让我们（笔者和网友们，当然也希望王光美女士、刘源先生能够参与的“我们”）学习美国精神和美国性格。这是圣诞老人给中国人至为宝贵的礼物。

思考、反省得越是深入的人，学习、吸收越是丰富的人，无疑，将是新旧世纪之交最富有智能的人。

圣诞即将来临，圣诞树下堆满了礼物，六岁的女儿正在弹奏《Joy To the World》，乐音袅袅。

上帝保佑每一位网友。

上帝保佑美国，上帝保佑中国。

~~~~~

【春秋史笔】

周恩来与刘少奇之死

• 樊 功 •

一直以来，大陆官方的舆论都是一口咬定：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愚弄的民众，也都把刘的死归咎于“四人帮”的邪恶，而不知道整死刘少奇的主谋是暴君毛泽东，而帮凶正是周恩来，“四人帮”只不过是打手而已。

毛的晚年，已经完全沦为一个疑心病极重的老狐狸。总是疑神疑鬼的，对谁都是不放心——这也是暴君晚年所特有的症状。自己把刘少奇扶持起来，但却对刘少奇纠偏他发动起来的“大跃进”心存不满，更甚者——民间出现了“两个主席”的说法，这让一向独霸的毛更是不满，怎么会是“两个主席”？红太阳只有一颗啊。而苏联当局在赫鲁晓夫的主政下，对暴君斯大林的批判更是让毛感到毛骨悚然，如果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与斯大林的残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毛泽东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而毛泽东自己就把刘少奇的角色定位为是日后之“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必须剪除。“文革”的发动，本身就是一场剪除异己的大清洗运动，而刘少奇则是毛必须剪除的最主要的对象。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一书，比较客观的披露了“文革”中周恩来作为整死刘少奇帮凶细节。在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这个问题上，原先周也是认为欲加之罪，不愿意趟这个浑水。但是毛泽东则硬要把拉他下水，而周也是硬着头皮，虽问心有愧但还是做了毛泽东整刘少奇的帮凶。因为周恩来的为人处世，一向都是只站在强者的一边，对弱者虽有同情，但那也是不为所动。

毛泽东让自己的老婆，作为“主席一条狗”的江青解决“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一案。既然是“狗”，就会对主子拼命的摇尾巴，以显效忠。所以江青对毛的委托非常卖力：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断章取义，恣意捏造出了三本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所谓的“罪证材料”，报送了中央。报送材料的同时，江青也不忘向毛泽东摇尾巴，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晚年周恩来》，第248页：江青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批示，1968年9月16日。）江青在刘少奇“罪证”的批示上，用了五个“大”字，四个“最”字，可谓用心险恶！这厚厚的“罪证材料”也是要给周恩来批示的。

虽然周恩来也知道刘少奇的“罪证”有若干的疑点，许多材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迫于江青的雌威，毛泽东的压力，在政治与良知之间——周恩来毅然选择了政治。看到毛除掉刘的坚定决心而决定“顾全大局”，跟毛走到了一起而与刘少奇一刀两断！在江青将刘少奇的材料送达十天之后，周恩来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晚年周恩来》，250页：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就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问题该毛泽东、林彪的报告，1968年9月25日，周恩来手稿。）而后，周恩来在给江青的信中，不但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真心话”，而且顺便向毛表示了效忠：

“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贩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

刘贼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首先要欢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革命，怎样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

周恩来在给江青的信中，不但狠狠踹了刘少奇一脚，也向毛泽东表示了效忠。用词的口气，跟江青最先的批示如出一辙。一幅落井下石，摇尾效忠的奴才相毫无保留的表露了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为了保住“晚节”的周恩来——在良知与政治之间，周选择了政治。一个在共产党高层工作了那么久的人，一个对各位高级干部都十分了解的人，就这样同意了刘少奇“罪证材料”的报告。没有怀疑，并不抵制。要不是有高文谦先生这本《晚年周恩来》，很多人还是活在“周恩来‘不清楚’江青一伙伪造的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相信了这个报告”的谎言当中。

陈奎德先生有篇《审毛：中国未尽的公民作业》的文章，阐明必须要把毛在中国干下的滔天大罪一一清算。在我看来，毛的罪恶世人虽不完全知晓，但“文革”之不得人心已经让中国人对这个暴君有所鄙夷，对毛的残暴形象是有一个轮廓的（哪怕不是很清晰，但是对于毛的残暴也是有所了解）。但是周恩来则不一样，至今他还是中国许多为官者的榜样，在民众中还有个微微发亮的光环。所以，批周评周是比清算毛更难的一项“未尽的公民作业”。

历史是用人民的鲜血谱写的，而不是御用文人的碳墨写就。周恩来在历史的真实面目，有待于用血写历史的人民一步步理清，而《晚年周恩来》一书，给我们了解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材料。在刘少奇的被整死，不能完全归咎于“恶贯满盈”的“四人帮”，“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有着不可推卸之重大责任，他正是整死刘少奇的帮凶！

~~~~~

【研究评论】

“文化大革命”起因研究综述

• 衣晓龙 •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大的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已经过去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来，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地反思和探求这一民族灾难的根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文革”的起源作了简要的回答，是研究“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但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发生若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就显得过于原则化、简单化了。因此，学者们并没有囿于《决议》的定论，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个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到1985年，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所以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总体反思，给“文革”予以定位，《决议》的发表为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所以有很大一部份研究成果是对决议宣讲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从1986年到1995年为第二阶段。由于这一时期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的影响已经渐渐消退，所以学术界也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将“文革”纳入历史学研究中去，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但是，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不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被译介到国内，对于开阔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是不无好处的。第三阶段，

从1996年至今，由于“文革”结束二十周年的到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所以在这短短几年，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革”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革”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给“文革”的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术风气。

本文拟从几个角度把二十五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 经济动因说

由于“文革”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革”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角度。

（一）当时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毛泽东的空幻的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体制的日益僵化和空幻性，进而产生了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升级。研究者认为，当时具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文革”发生的基本条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文革”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对党内对经济建设上的分歧的错误定性也根源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认为要建设他所推崇的带有平均色彩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必须清除某些障碍，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他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1）

（二）来自中央的经济决策上的“左”倾错误，在某些人的鼓吹和渲染下，进而升级到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上。研究者认为，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2）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视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所以他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并且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忧虑。为了进一步推行他的经济主张，他在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份”予以清除。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3）

（三）还有研究者跳过了“左”倾错误这一环，认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些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都根源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又围绕着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逐渐激化和升级。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革”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正是“文革”这场内乱赖以产生的经济根源。（4）

◇ 政治动因说

“文革”是一场政治性内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我们可将此称之为政治动因。根据研究者的切入点不同，可分为以下几个角度。

一、执政党建设上的失误。中国共产党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执政党，其自身建设上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运的兴衰。而当时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严重失误，正是

这些失误造就了“文革”。

1、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建设失误。在这方面学术界一直视为禁区，邓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错误与现行制度的弊端有直接关系。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问题由于毛泽东在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导致了“文革”的十年浩劫。（《邓小平文选》293页）正是由于这些制度问题的缺陷，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而且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是通过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实现的，他把个人专断强加给集体，集体又往往接受了他的个人专断，这种无制约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5）

还有研究者由此认为，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党内不同意见的产生，但被无限上纲为阶级斗争，甚至有人将这种斗争简单化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政治较量，关于这一点，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更多地出现在外国学者的著作里。

2、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6）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并在1965年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这一错误观点更加发展，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种“左”倾的错误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7）

二、领袖个人失误。毛泽东视“文革”为他对中国人民两大贡献之一，甚至高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是他的悲剧。毛泽东对于“文革”的发动和完全失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一直有人认为不应把“文革”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毛泽东置于“文革”的主角地位，“文革”的发生与毛泽东个人的确是有很大大关系的。我们不可否认晚年毛泽东依然怀着良好的愿望，在谋划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在《五·一六通知》（主旨在“破”）和《五·七指示》（主旨在“立”）中体现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主观意图。他在相关文件中所构画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分工、消灭商品的平均主义社会。这一蓝图为他的“文革”失误作了最好的注脚。其失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他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1956年反冒进的反命题，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大跃进”是当时中央领导中“左”倾错误的产物，是被作为1957年整风运动之后必然要出现的“经济建设高潮”提出来的。其实当时全党工作的重心实际上并没有放在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的“跃进”是从政治的推测和政治的需要出发，对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很不足，可以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八个字来概括，伴随着它的是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一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给这一路线的错误性质作了鉴定。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毛泽东发动的，这个“一大二公”的组织形式，寄托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空想。这种“空想”成了“三面红旗”的灵魂，而“文革”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8）

2、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把矛盾置于“事物运动的根本原因”这一特殊的、主要的地位，而毛泽东则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他声称：

“无产阶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其斗争哲学的核心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毛泽东说：“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自1963年开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种阶级斗争“情结”，即把任何情况都当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处理任何事情都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文革”前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凭高度想象力虚构一幅阶级斗争图画的模式。（9）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带有一种随心所欲的非理性化的概括性，诸如“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就得“再来一次”。（10）

最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他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觉察，甚至还把党内上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意见看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其实，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

3、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但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他是把“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具体来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是他进行反修斗争的重要契机；毛泽东以自己的“左”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去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社会主义改革看成是推行“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他下决心在中国推行“反修防修”，发动“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论战的发生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批判严重影响了毛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全国的政治生活。（11）

4、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在这里我们要分清个人崇拜和维护领袖权威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我党历史上包括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对搞个人崇拜。在1958年三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的话，他说有的人反对个人崇拜，是反对崇拜别人，而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12）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把“文革”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看，二者在人们心理上是有共性的，即要寻求超自然力的庇护，以解除外部世界的危机和恐惧。这就唤起了对救世主的渴求，为个人崇拜的狂热铺上了心理之路。另外，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固然这也是原因，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13）

5、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文革”首先在文化领域打击知识分子开始，这源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仇视。1964年，他就说过：“读书越多越蠢。”这句话在“文革”中成了“读书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几乎一律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改造的对象。毛泽东乐于见到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他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肆意糟践成了发动“文革”的动机。（14）

三、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开始较为系统地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从最初对《决议》的具体阐释，到对60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的分析，这些研究尝试对于人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去回视“文革”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决议》指出：“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成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至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延伸和补充，认为“文革”的爆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这种背景一方面使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论战，它是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左”倾的极其重要的“助剂”。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为毛泽东提供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蓝本，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事实上的危险，终于发动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5〕

除了苏联的背景之外，另有学者还认为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交互作用下处于动荡局面，而这又给帝国主义以反苏反共的口实。这种国际背景给中共和毛泽东影响是直接的，在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反复强调，这是因为两国的执政党没有抓好阶级斗争。当1957年夏季因毛泽东主动提出让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而知识分子也因此激起了向党提意见的积极性以后，毛泽东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并且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于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造成了建国以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升级，成了“文革”的肇端。〔16〕

另有学者认为，6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着间接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冷战环境和反抗大国控制的斗争，使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产生了“左”的偏差。而当时中国虽然正确提出了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命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过去的经验，把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的作法不恰当地搬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加上其它各种历史因素的作用，使中国探索的路子越走越窄，每一次纠“左”带来的都是“左”倾错误的升级，以至走到“文革”的歧路上。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文革”的作用。〔17〕

还有研究者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文革”的泥潭。〔18〕

◇ 文化动因说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革”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传统文化流毒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文化、民族封建固疾的总爆发，是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作怪而引发的，是封建主义恶性肿瘤的一次大面积穿孔，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忠君观念、集权主义、个人专制、封闭意识、平均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建国以来一直很少得到系统的清理和根治，无时不渗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人民的道德规范领域

中，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在我们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19）

（二）文化冲突说。有的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同现代文化体系激烈对抗的一次集中性体现。“文革”的发生完全不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体系同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格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尖锐冲突。“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归，它只不过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现实表现或延伸。但是，不同意此说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并未真正发展起来，构不成对传统文化的威胁。（20）

（三）马克思主义封建化说。学者认为，由于中国没有大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这些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就容易被抽掉了前提和精髓，只剩下了一些结论式的语录。这种具有强烈实用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文革”的发生埋下祸根。（21）

对于这种把“文革”的发生归咎于封建传统文化的讲法，许多学者不同意。他们认为，首先，传统文化不能等同于封建主义；其次，封建思想的残余虽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在我国现代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若将“文革”的发生简单的归因于封建主义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确的总结历史教训。（22）

另外还有学者将“左”倾错误纳入文化领域来考察，显得颇有些新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从左倾思潮看来，知识分子是持其所创造和拥有的知识而居于精神上的特权地位，各级党政干部则是因其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导致思想上的特权意识和官僚主义现象。而试图从根本上打破这种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社会不同劳动方式的差别，以从根本上杜绝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来实现平均主义的社会，所以就有必要对整个社会的分工进行一次倒置性调整，改变劳苦大众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这就是“文革”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23）

学者徐友渔认为，作为“文革”主力军的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直接导致了这一特殊群体在“文革”中的反常，这对于“文革”无异于雪上加霜。他认为6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造就了红卫兵和“文革”。当时用来教育年轻人的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晚期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说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一个极左的品种。“文革”前教育和意识形态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对革命的狂热，对领导的盲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助于“文革”时的恐怖气氛，而达到极致。而“文革”前，灌输给年轻人的是革命第一的斗争哲学，而且伴随着文化上的蒙昧无知保守野蛮。最终红卫兵所具有的革命的狂热、虚幻的济世主义和天真的民粹主义，推动了他们整体的失态，有力地推动了“文革”。（24）

除了以上几种较为明显的文化考察之外，社会学家刘小枫引进西方社会学中的“怨恨理论”来解释“文革”，为了行文的紧凑和方便，我们姑且也放在文化里面来叙述。他提出，“文革”的爆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思想理念、日常生活结构全面移动中积聚出群众行为中的怨恨。而“文革”作为一场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正是受这种怨恨心态支配的，是政党意识形态“符号”护卫下的社会怨恨的大爆发。他还提出了政党意识形态、政党伦理和政党国家的社会体制三项分析性概念，认为这是“文革”爆发的社会性怨

恨的历史积累机制。另外，它还有以下几个观点，即“文革”事件作为“怨恨”的爆发，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实在内部的结构冲突的结果；政党伦理化的精英之构成和代层之间的冲突是“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群众层面的群众与“革命”群众之间的生存性紧张和国家层面科层精英与“革命”精英之间的生存性紧张，也是“文革”爆发的原因。（25）

◇ 心理动因说

从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

学者认为在个性品质上，毛泽东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感，不容易接受别人的看法，而长期的革命实践形成了他处理问题的心理定势和“斗”的哲学。另外其行为还受命令现象、典籍文化的负效应、超社会责任的负效应的影响。从领导心理学来看，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文革”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文革”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革”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26）

另有学者认为，当时封闭式的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势、“左”倾理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引导、反革命集团的蓄意煽动、社会传媒等复制环境的刺激作用，决定了群众狂热的崇拜心理、病态的恐惧心理、固执的自大心理、消极的保守心理、幼稚的盲从心理、扭曲的逆反心理。这些变态心理引爆了“文革”。（27）

◇ 国外研究动态

自从“文革”爆发以来，国外学者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一世界史上都罕见的社会动乱，由于他们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所以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也不乏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本文将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单独作一综述。

由于“文革”之火是毛泽东亲自点燃的，因此，国外学者基本上集中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研究角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坚持他的社会理想，二是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三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多数领导政策分歧，由此导致权力斗争。

说来十分有趣，一大批西方学者接受了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说法。陈认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于修正主义的根子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务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改造群众思想，使之为革命而牺牲物质利益；第二，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三，改造知识分子。哈定则认为反修的任务主要针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希望青年关心革命，关心国家大事。依斯美（Jean Esmein）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助手发动人民群众，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使党得到新生。富勒尔（Victor C. Funnel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完全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和经济有关。毛泽东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胡费尔（Richard M. Rfeffer）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以前的革命的继续，可以把“文革”理解为一场更大、

更雄心勃勃的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当中国社会出现等级化、特权化时，毛泽东希望恢复革命的活力，重申他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就像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曾主张的那样，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为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导致的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

另一批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待“文革”的起源。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断言：“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不仅如此，他还要通过运动在党内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不可能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伯雷汉声称：“毛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并消灭党和政府中的敌人，代之以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支持者。”他还认为，“毛对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关于“文革”的起因，持第三种解释的人最多，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位杜特（Garg Dutt & V. P. Dutt）在《中国的“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对于采取什么办法肯定会有分歧，而政策分歧往往发展得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和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杨（C. K. Yang）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文革”本来关乎文化和意识形态，怎么会变成夺权斗争？他的回答是，这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搞修正主义，于是清洗文化领域扩展到党的高层领导，他认为运动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如此。约菲（Ellis Joffe）在《“文革”还是权力斗争？》（China in Mid-1966: "Cultural Revolution" or Struggle for Power?）中指出，这场运动是二者兼而有之，意识形态的整风运动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力问题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一直担心，除非不断努力使革命火焰燃烧，否则中国就会变修。赫尼克尔（Paula J. Hiniker）提出他所谓的“不和谐归化”理论来调和权力之争说和意识形态之争说。他的这个概念颇为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信念不同的人对一件事的失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大跃进失败了。不坚信它的人认为它不切实际，而坚信它的人则认为有阶级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搞破坏。他承认“文革”有权力斗争，但认为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服从于达到意识形态一致的手段。他的理论可以对毛泽东要打倒谁作出更好的预言。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的观点属于这最后一派，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最后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也有人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归于两人的性格、气质的差异，以及由于革命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工作作风。安边戎（Byung Joon Ahn）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个性、最高元首式的，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直接与群众沟通；而刘善于组织，在党内操纵，依靠庞大的体制化机器，这两种十分不同的作风最终会发生碰撞，演化为权力的冲突。迪特默持类似的见解，他说，毛感情冲动，性格奔放，刘一丝不苟，谨小慎微；毛的性格适合在广大农村动员群众打游击战，而刘的作风与白区工作需要极端小心有关。

附带指出，迪特默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路线斗争》（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一文中，都把毛刘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路线斗争”，即是说，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有歧见的而无法调

和导致的斗争。作为西方学者，他是对是非功过不作价值判断。他强调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起因于路线、政策分歧，而不是预先有一个“密谋”，蓄意打倒刘。而刘的倒台是运动中群众起来，斗争不断升级的结果。

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喜好从文化与传统角度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政府。对待“文革”，他同样如此。他认为，在老年毛泽东那里，中国古代贤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份量。他不像刘少奇和列宁，事事领先作为先锋队的党，而认为党之外的普通群众不能通过组织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毛和卢梭一样，认为群众不必是他们本身所是的人，而是可以是”应当成为“那种人，这导致了领导用自己的光辉思想来改变人性。

里夫顿(Robert J. Lifton)的观点似乎有点荒诞不经，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他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在晚年面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后的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份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28)

以上主要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的“文革”史学界里，大至有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第一、以权力斗争论和权力政治论为基轴解释“文革”，称之为“权力政治论”研究方法。学者对这种方法作了如下解释：首先，以毛、刘为首的两个上层权力集团出现对立，这种对立扩大到全党，不久又席卷党外乃到全国，这就是“文革”。

第二、认为“文革”是为实现某种理论和目的发动起来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某种因素和作用变质了。我们称之为“理论变质论”研究方法。加美先生所说的“走向反面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不属于东西方体制任何一种，而是作为“第三种体制原理”的“亚洲公社国家”的理论。它的核心是继续革命论。毛泽东的“公社国家”论，原来是以在亚洲农村中历史地表现出来的自主管理和互相合作的共同体的社会原理为基础的，但由于它与国家原理结合，必然具有对敌即武力斗争和对己即互助合作的双重意义。对敌意识随着“继续革命论”而扩大，形成了一种在伙伴中也可以寻找敌人的政治气氛。在当中，互助合作的原理变质成相互监视的原理。进而，由于“文革”过度敌视市场原理——这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认为市场原理是来自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连自主管理原理本身也不得不露出破绽。于是，追求“公社国家”理论的“文革”最后走向反面，造成了十分凄惨的结果。

第三、学者天儿慧提出“结构相关论”研究法，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都有联系，同时又表现出多种形态。如果把“文革”人微言轻凝聚着人类本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政治社会现象来理解，就应该从背景和实践形成的结构性以及被结构化了的的主要万分的相关性中考察“文革”的各种现象及其意义。

作为同“文革”有关的基本结构，他认为有由传统的历史、亲身经历、自然环境、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等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总的政治土壤、决定与招待政策的体制）和思想结构。而且，在这些结构中，与“文革”有关的人们作为结构的主要成份发挥了各种的不同作用。

另外，天儿慧还提出了五条逻辑来说明用这种理论解释“文革”的可行性，即，1、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围绕共产主义世界（平等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等）的实现引起的纠纷。2、

情感的逻辑——围绕血统论和特权思想的纠纷。3、政治的逻辑——围绕敌友论、人治与法治论、官僚主义体制与干部、个人崇拜的纠纷。4、经济的逻辑——围绕经济发展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优先论）、经济效率论的纠纷。5、生存的逻辑——维持生活和改善生活，弱肉强食的逻辑的展开和纠纷。（29）

以上这些外国学者的研究角度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虽然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有不少考察是不符合史实的。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批判地去看待。

从以上综述看来，这二十五年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但是由于尽人皆知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这一领域中的难点。虽然如此，“文革”作为我们民族的灾难，我们应该继续反思下去，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局限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将“文革”起源的研究向更本质的方向推进。

注释：

- （1）邢燕芬李振生《“文革”爆发的经济根源新探》载于《理论教育》1988年12期
- （2）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载于《争鸣》1989年1期
- （3）张化《关于“文革”时期党史研究综述》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5期
- （4）高永昌《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5期
- （5）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载于《红旗杂志》1981年第16期
- （6）柳建辉郑雅茹《执政党建设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载于《理论学刊》1989年第4期
- （7）张化《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5期
- （8）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载于《争鸣》1989年1期
- （9）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P154——157
- （10）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 （11）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42页
- （12）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载于《红旗》内部文稿第30期
- （13）邸彦莉《“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载于《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4期
- （14）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50——151页
- （15）宋银桂《中苏交恶与“文化大革命”》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
- （16）同上
- （17）张化沈汉《六十年代中期国际环境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18）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70页
- （19）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载于《争鸣》1989年1期
- （20）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
- （21）同上

- (22)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264页
- (23) 杜蒲《对“文革”前夕及“文革”时期党内“左”倾思潮的文化考察》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4期
- (24)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39——162页
- (25)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5—434页
- (26) 廖雅琪朱霁青景怀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载于《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
- (27) 路宁《“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变态心理剖析》载于《争鸣》1989年第2期
- (28) 参考徐友渔《直面历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版
- (29) [日] 天儿慧著、韩凤琴译《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综述》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